

· 会议发言 ·

解放的学说和实践的智慧^{*}

——简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

孙 利 天^{**}

马克思在充分吸取德国古典哲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终结了客观知识乃至绝对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实现了伟大的哲学变革。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内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实践的理论和理论的实践。正是这一独特的理论性质，吸引了苦苦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使他们获得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找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解放道路，开始了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进程。伟大的理论化为伟大的实践，而艰苦卓绝的伟大实践也必定产生伟大的理论成果。一百多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研究和发展，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许多原创性的理论贡献，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仍具有勃勃生机和活力，仍是当代世界最有影响的主流哲学之一。

一、辩证法的经验化和实践智慧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终理论成果，也可以说是柏拉图主义的完成或传统哲学的完成。它以宏伟的概念辩证法体系概括了当时人类文明所达到的全部成果，成为综合了一切知识的绝对知识，达到了解释世界的极致。“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包括费尔巴哈、马克思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不满足于对世界的解释和说明，急于寻找到让哲学走向世界、让世界成为哲学的世界的思想道路，问题在于如何让完美的理念达于经验的现实。马克思在他的传世经典《资本论》中，终于使黑格尔高度抽象的辩证法获得了经验的、实证的表达形式。马克思在对商品、劳动、货币、资本等的内在矛盾分析中，充分展示了辩证分析强大的逻辑力量和实证的经验意义，实现了思辨和经验的完美结合。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于消费者是经验的事实；商品的价值在经验的价格波动中被反思和提炼出来；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价值；而私人劳动能否转化为社会劳动，是商品价值能否实现的关键，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根本动力，也是它陷于危机进而自我否定的总根源。至此，黑格尔逻辑学的范畴进展，回到了经验的、现实的经济关系的演进，而在经济关系中的物与物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对抗。《资本论》作为工人阶级的

^{*} 本文为作者在江苏师范大学哲学范式研究中心主办的“真理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原创性贡献”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稿。

^{**} 作者孙利天，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吉林 130012）。

“圣经”，是因为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解释，已成为无产阶级谋求解放的实践的指引和理论的预演，成为内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强大精神力量。

仅从辩证法理论的科学意义上说，《资本论》的辩证法也具有科学革命的意义。对传统的科学研究来说，科学理论必须具有逻辑的一致性，“矛盾”是经验科学必须排除的东西。为此，黑格尔曾嘲讽康德对事物的“温情主义”。马克思的《资本论》证明，矛盾不仅是黑格尔本体论构造和思想把握世界的固有方式，而且也是经验研究和科学思维的有效方式。矛盾的双方完全可以获得清晰的科学的描述，矛盾的自身进展也可在辩证分析中作出经验的预测，并得到经验的证实。《资本论》之后的现代物理学似乎表明，物理学也需要辩证思维。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原理，物质与暗物质、反物质以及量子纠缠等，都突破了经典物理学的知性思维界限。辩证法的经验化、实证化不仅在理解人类社会这种黑格尔称之为高级的精神现象中不可或缺，在直观自然理念中也显出效用。

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在对自然之道的静默领会中，朴素地直观到宇宙人生的辩证原理，积累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所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传入中国之后，人们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古老的东方辩证智慧对于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辩证法应是宝贵的思想资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紧迫实践需要中，辩证法迅速成为“伟大的认识工具”，作为用以解决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论。在革命战争时期，一方面因为中国有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因为军事思维典型的博弈性质，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思想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使其成为高超的实践智慧。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潜心研究黑格尔《逻辑学》，写下了影响很大的《哲学笔记》，为后来人们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埋下了伏笔。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写作了《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重要哲学文献，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辩证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矛盾分析方法，形成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的方法论。这对于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情境中把握住矛盾体系中的重点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保持对全局的战略把握和清醒的思想意义十分重大，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具有难以估量的伟大作用。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辩证法，是博弈性的、对策性的实践智慧，是在特定场域和历史情境中直观本质、把握主要矛盾的战略思维，它必定充分吸取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智慧。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也可以说是抗战初期的“隆中对”。在敌强我弱的政治军事格局中，如何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和消长变化，如何找到由弱变强的现实道路并最终夺取胜利，这不仅要复杂矛盾体系的各种矛盾和矛盾的各方面作准确的经验描述，而且要作出各种矛盾力量消长变化的经验预测，并且要在经验的实践中大致确定矛盾根本转化的节点。如此复杂的矛盾分析，不仅需要与之相关的大量的经验知识，也需要思辨的理念贯注其中。在面临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中，若要作出正确的战略决定，也需要直面现实，争取胜利的勇气和意志，这就是习近平主席所说的“战略定力”。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的智、信、仁、勇等品格，在复杂的战略思维中共同构成了高超的实践智慧。实践智慧的辩证法，是直面事情本身、在特定的实践场域和情境中作出正确或最优决策的辩证法。它既保持着矛盾分析和思辨思维的哲学维度，又要把思辨的理念融入或转化为经验的表现形式，并且按照事情本身思辨和经验的双重逻辑，指出其必然的方向和促进经验的实现，从而得到形上和形下、思辨和经验的双重证明。这种复杂的辩证法结构，由于强调实践的效果和经验的证明，已超越了黑格尔逻辑学辩证法的复杂性，难以作出体系性的理论建构。作为博弈性、对策性的战略思维和实践智慧，它只能因时、因事而灵活显现。而思辨分析、

经验知识和本质直观等是实践智慧辩证法的基本要素，这需要实践智慧的主体具有高度的哲学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二、改造世界观和主体修养

西方哲学的主流是追求普遍真理，从而思维如何把握存在的知识论和真理论是它的核心主题。思维把握或切中存在，必须有对思维或认识的主观方面、主体方面的反思和了解，西方哲学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在康德先验哲学中实现了辩证的统一：一切知识都只能来自经验，但先验的思维规定是经验得以可能的先天条件。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认识的主观方面，发现了意识的能动方面，即先验统觉原理。但康德对意识和思维能动性的揭示，是意识的机能性或形式原理，并未触及认识主体的社会性、历史性规定，只是在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中，意识形式或精神现象的发展才有了社会性的历史内容，从而也为理解具体个体的认识主体的精神发展提供了辩证的方法。黑格尔强调，人应当尊敬自己，以配得上高尚的东西。在黑格尔哲学中伟大高尚的东西就是表达人类文明的普遍精神和理念，个体精神经历漫长的教化和发展以达到普遍的绝对精神，这是人的使命和荣耀。所以，可以说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不仅思辨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也具有现实的个体作为主体的修养论意义。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改变了西方哲学的主题，不是思维如何把握存在的解释世界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如何实践地改变世界的问题，无产阶级和人类的现实解放成为哲学的根本任务。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为西方传统哲学的知识论提供了全新的解释，社会历史性的物质实践，是一切认识之谜的解答。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也需要形上的理想和规范，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共产主义的个体和主体的存在样式。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也是主体解放、人性实现的精神成长和主体修养的进程。列宁在俄国革命的实践中，提出要向工人阶级灌输革命理论，使其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要求共青团员要学习和掌握人类文明的全部成果，唯此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等日益成为事关成败的重大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主体修养的精神维度势必日益凸显出来。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上，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在改变客观世界的同时改变主观世界，“改造世界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大的原创性贡献。如前文所述，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是无产阶级解放和精神成长、升华的进程；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要求也必须要花大力气进行思想建设；更为重要的是俄国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是在东方落后国家进行的，理论灌输、思想教育和引导等成为组织人民群众的重要途径。改造世界观、提高党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注定是东方无产阶级革命生死攸关的重大任务，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实践。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能取得今天这样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时刻不能离开这种改造世界观的理论自觉和历史实践。从哲学理论上说，改造世界观是特殊的意识能动性实践，是以思想认识、思想觉悟的提升为目标的精神修养过程，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内化为个人自觉的精神信仰、认知和态度框架的复杂精神过程。可以肯定，改造世界观的思想实践，具有提升人的思想认识和境界的重大作用，特别是在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条件下，毛泽东倡导的革命精神、革命干劲，曾创造许多人间奇迹。但按照唯物史观的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和社会的精神文明高度是相互依存的，因而，世界观改造的有效性空间是有限的。即便是一些杰出人物或英雄人物可以一定程度地超越社会历史的局限，达到圣贤、君子和共产主义人格典范的高度，但社会总体的精神水平总是受制于时代的

物质生活条件。如果脱离了时代的物质条件所限制的普遍精神高度，通过改造世界观强力提升人们的思想觉悟，就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问题的关键似乎是中国哲学所说的内外之理，人的精神成长或主体修养从根本上说是内在自觉的精神实践，强力的“外炼”可以使人合于礼，而不能仁，也可能产生伪君子、真小人的畸形人格。

我们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基于人的德性自觉，把充分实现人的道德能力视为人的使命和意义，因而，哲学的中心任务是如何实现道德能力的修养论。人的道德修养不是孤立的内心实践，它只能在“修齐治平”的事功中完成，因而主体修养的实践和学人、仕子的社会实践是内外统一的践履笃行。主体修养固然要尊法崇礼，也需要师长的点拨教化，但从根本上是主体固有的良知良能的启发、培育和致于事物，是孟子所说的养浩然之气，王阳明所说的内心光明。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日新又新”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切磋磨砺，日益进取，确实能造就杰出的伟大人格，他们不仅修心修身有成，而且能立言立功，造福国家百姓。这种知识分子代代传承的道统，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文明不绝的重要支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我国，主体修养有了新的世界历史内涵，科学精神、理性精神以及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等成为一代新人应有的素质和品格。但从修养的逻辑来说，改造世界观，提升人的思想和道德境界，仍需要以主体的自觉自省、奋发而为作基础，仍需要以存养、精神的自身成长作为主要任务。也许正是因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避免地吸取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修养论，我们才能造就无数共产主义的先进分子和英雄人物，才能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与中国传统的修养论相结合，创造中国特色的改造世界观和主体修养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

三、实践转向之后的理论维度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传统的哲学观，哲学不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不再是美国哲学家普特南所说的“神目观”，人不能在世界之外静观到世界的绝对规律和原理，而只能内在于世界，并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解释世界。黑格尔已经把社会历史作为精神发展的概念引入了真理的理解，马克思把社会历史的实践看作真理的基础和标准，中国传统哲学的修养论则把主体修养的维度作为知识和真理的条件。直观的主客符合的真理观即便在西方的科学哲学中也早已被否定和抛弃，但在学院化的哲学教育和研究中，仍需要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理论态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作为经典的客观性知识来学习和传承。把人类解放的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智慧作为标准的客观性知识来学习和传承，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按照纯粹理论哲学的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没有某些西方哲学系统、严谨、论证充分，这似乎也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高度和知识水准。不必讳言，在国内外大学的哲学系多少都有轻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之后真的会降低哲学的理论水准吗？实践转向之后如何不断提升哲学的理论高度？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之后，并不否定纯粹理论哲学和学院化哲学研究的意义和作用。海德格尔的说法是正确的，“改变世界也需要解释世界”。真正与传统哲学的区别是，世界不是给定的永恒不变的世界，而是在人的历史实践中不断生成、不断展现出新的事物和规定性的世界，历史实践所呈现的世界需要科学和哲学理论以纯粹理论的态度研究、探索，唯此才能更好地改变世界。实践观点的世界观，是人与世界否定性统一的世界观，一方面实践否定了世界单纯的自在性和客观性，使世界成为属人的、服从人的目的和需要的世界；另一方面实

践也否定了人的单纯的主观性和目的性，不合实际的幻想在实践中被否定和扬弃，实践是人和世界在相互否定中的双重自我生成。如此理解的世界，必定需要理论维度的深刻探索，更需要以纯粹理论的研究作为根本的人本身。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转向之后，不是取消了理论哲学的意义和作用，而是更加凸显了理论哲学研究的难度和深度。在对世界的研究和解释中需要思考人的因素和作用，而对人的反思中就要反思人的世界，在人与世界的缠绕中辩证思维有了真切的世界历史内容。

其次，我们必须在马克思理论哲学的高度上实现哲学的实践转向。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既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颠倒和变革，同时也是对它的批判和继承。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比之于当代世界各派哲学丝毫不缺少理论的深度和彻底性。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达到了马克思本人哲学革命时的理论高度。列宁在《哲学笔记》中，通过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深深感到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理论的肤浅，感叹不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能懂得马克思的《资本论》，甚至说没有人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的感慨并非一时的兴发之见。在又是百年之后，当代哲学家有多少人敢说自己真正懂得黑格尔？我们也不敢说自己真正懂得了马克思。仅就前文讲到的辩证法或思维方法来说，我们真的掌握了区别于经验科学方法的科学的辩证法吗？辩证法的经验化、实证化是可能的吗？以诚实的理论态度去作艰苦的研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改革开放的 40 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工作者解放思想，重新出发，充分利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资源，重新理解马克思，无论是近黑格尔式的马克思哲学理解，还是近康德式的马克思哲学理解，都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我们可能比以往也比国外更接近马克思哲学革命所处的哲学高度。离开马克思哲学革命所拥有的理论资源和理论高度而谈实践转向，我们只能教条式空谈一些哲学话语，也可能退回到古典的经验论和怀疑论的立场，甚至会得出取消哲学、不要哲学的结论。

最后，我们必须保持理论和实践的张力，给理论思维以更宽广的思想空间。理论要服务于实践，因而也要关注实践，与实践相结合。但是从实践观点理解的理论，它就内在于实践之中，它是实践的思想实验和理论预演。因此，它必须拉开与现实实践的距离，从而才能在更宽广自由的思想空间中操作、排练。海德格尔批评马克思哲学这种思想节目单式的演出仍是主体形而上学，那么我们可以让思想的自由运作倾听存在的召唤，注入诗意的美感的元素，从而让未来的实践向着真善美统一的方向演进。思想空间的拓展需要思辨概念的支撑，理论的抽象愈稀薄，思想的空间愈广阔，在思想中打开新的道路的可能性愈大。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必担心超越的形上思考脱离实际，不必害怕理论的抽象和晦涩。按照恩格斯的看法，理论思维是一个民族站在时代科学高峰的条件和标志。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思维模式看，理论想象的空间不管多么辽阔，归根结底仍受制于时代的历史实践水平。因此，我们不仅要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辨的理论维度，而且需要了解、研究和借鉴当代西方哲学各派理论的成果。西方当代哲学的各种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态度不同，褒贬不一，但它们同作为当代哲学理论，总是从不同的方面表达着当代西方社会历史实践的新特点和新性质，这对于我们把握全球化人类实践的特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足资吸取和借鉴。

〔责任编辑：陈凌霄〕

indispensable “three poles.” This determines that historical research is unfolded in the epistemological domain and sens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is hermeneutical nature, therefore, the understanding and judgment of historical truth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historical hermeneutics.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concepts such as “compulsory interpretation” and “public interpretation”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Chinese historical hermeneutics. How to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and discourse system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history and real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the mission of the times and an urgent practical task for Chinese historical scholars.

How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ography and People

Jiang Meng • 92 •

In the past, Chinese academia ha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who are the makers of history. However, in the practic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 major theoretical issue, t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ography and the people has gotten less attention and remains unsolved. The late Qing historical workers had little divergence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ography,” but were much divided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people.” On the contrary, disagreement on the meaning of the “people” decreased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but became more diversified on “historiograph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lthough the controversies over “historiography” and “people” were reduced, historiography moved away from the general public through “historical revolution” and other campaigns.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historical circles tried to embrace people by emphasizing “application,” but it was halted due to the turn of academic trends. Today, this major theoretical problem remains unsolved in Chinese history field. A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new era should start with serious thinking about “how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ography and people.”

Clarify Some Misunderstanding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Xu Sumin • 106 •

Several different opinions have gained certain popularity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in the past 20 years. First, it is believed that Western philosophy is the “prototype” while Chinese philosophy is its “derivative.” Second, the translation of “metaphysics” into 形而上学 (*xingershangxue*) in Chinese is mistranslated, and “being” is not a research object in Chinese philosophy. Third, Western philosophy only talks about the dualism of noumenon and phenomena, spirit and flesh, while Chinese philosophy talks only about holism of “the Way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instruments (*Daobuliqi*)” and “the unity of form and spirit.” Fourth, it is argued that any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 logic and category implies a dismemberment of traditional thoughts; and any metaphysical innovation in Chinese philosophy is no other than “barbarians’ Chinese.” Fifth, it is believed that only Heidegger’s philosophy can activate sinology and promote convers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These opinions seem to have some misunderstandings over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The author attempts to put forward his own opinions for discussion.

Theory for Liberation and Practical Wisdom: On the Original Contributions of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Sun Litian • 120 •

• 128 •